



与外缘

盛邦和◎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核与外缘

中日文化论

盛邦和◎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内核与外缘: 中日文化论 / 盛邦和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617 - 7913 - 2

I. ①内… II. ①盛… III. ①文化—研究—中国②文
化—研究—日本 IV. ①G12②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4791 号

内核与外缘

——中日文化论

著 者 盛邦和
责任编辑 储德天
审读编辑 郑英旻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3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1—2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7913 - 2/G · 4620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再版序言

世界存在三种主要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与工商文化。三种文化形成四个主要文化区:儒学文化区、佛教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基督教文化区。每个文化区都是一个同心圆,都有一个内层核心,其文化向外辐射,形成这个文化区的外层边缘。可以把文化区的内层核心,称为“内核”,把文化区的外层边缘称为“外缘”。这样,同一文化区的文化也就有“内核”与“外缘”的区别。“东亚儒家文化区”是一个同心圆。本书试论中国是这个同心圆的“内核”,日本为“外缘”,而韩国、朝鲜、越南等国文化则介于中日之间,属“半外缘”文化。

以下的情况决定中国文化为“内核文化”:1. 人种发祥地。蒙古人种分布在中国、蒙古、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等地区,中国与日本同属蒙古人种。中国是蒙古人种的重要发祥地。2. 农耕源地。譬如中国与日本同属稻作文化区,但中国是稻作文化的发源地。3. 文化源地。中国是汉字的发源地,同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

日本不具备人种、经济与文化的“源地”性质;亚欧两洲连在一起,产生三个经济区:一,平原与河流农耕区;二,沙漠与草原游牧区;三,海洋与岛屿工商区。如有的学者所论,日本是第一区与第三区的“混合区”;日本不具备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文明特征,而成为“半亚洲”。以上诸多情况促使日本文化外缘性质的形成。

内核文化“古老性”、“单一性”与“自生性”的特点,决定它具有对旧传统的强大“记忆力”、对新文化的巨大“抵抗力”及对异文化的强势“同化力”。与此不同,外缘文化则具有“年轻性”、“复合性”、

“嫁接性”诸特点,缺乏内核文化那样强大的遗传记忆力,对新文化也不具强烈的“抵抗力”,而便于嫁接“新学”。

中国与日本文化分属“内核”与“外缘”的不同性质,显示两国近代发展途中的不同景观,成为两国现代化迟速的深层原因。日本迈出轻捷的步伐,迅速把旧文化转型为近代工商市场文化,而中国包袱沉重,行动迟缓,陷入“船大掉头难”的困局,无法将数千年陈陈相因的旧文化作适时的变革与更新。

随历史时空的变幻,世界文化中心处在不断的移动中。如黑格尔所说,精神的光明从亚洲升起,世界的历史从亚洲开始,此后如日经天,转移到欧洲;也如内藤湖南所说,全球文化中心依次以埃及、亚述、印度、中国、波斯、腓尼基、希腊、罗马、英国、美国的次序,轮换替代。而今发问:来日中心,“花落谁家”?

从中国的情况看,古代中国文化中心处于黄河流域一带,之后东移而入齐鲁。南宋后转而南进,遂使江浙等地物质繁荣,人文荟萃。及至近代,岭南广东率先“开化”,引领世风。日本文化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从京都向江户移动的轨迹。

文化中心的移动是一个奥秘,而究其实质总是按照一种轨迹作有规律的运行,总是从内核向外缘作滑行转移,昨日的内核难保“中心”的地位,今日的外缘必为明日的“中心”。世界上的强国一个个数过来,有谁是天生的中心?有谁不是崛起于外缘?西班牙、荷兰、英、法、德、美、俄都曾是外缘,结果都取得地区乃至世界中心的地位。日本是外缘,同样因外缘而崛起,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鸦片战争之后一段很长的时期,东亚儒学文化区内部中心移动,中国与日本“核”、“缘”位置互换。中国失去内核地位降落为外缘,日本则从外缘跃至内核的地位,代替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新中心”。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由曾经的“土地世界”的旧内核,变为当代“市场世界”的新外缘。

从内核转化为外缘,不是地理位置的转换,而是历史地位的变化,必然给中国以重大冲击与深刻影响,但结果却是有益的。中国文化成为外缘文化,将由辐射文化转化为受容文化,由单一文化转化为复合文化,由古老文化转化为年轻文化,由逃离世界的“拒斥文化”转

化为包容地球的“学习文化”。

中华文化命运之转换,始于文化更新之发端,是为小书“文化更新论”的题中之意。不必为中国内核地位的失落而感伤,一个民族文化凝固为“内核”,“尊者长者”的地位使其墨守成规、难越雷池。反之,既为当代世界的外缘,必将获得思想束缚的解脱。成规失效,遗存淡化,从此满怀希望与愿景,变农耕文化为工商文化,变内陆文化为海洋文化,作一个华丽的转身,赳赳日进,奔向新途。何必往后看,暮色苍茫中追寻过往的影子,倒不如洒脱而勇敢地迎接新时代的浪潮。中华民族的运势蕴藉于此,中华文化的未来寄托于斯。

沃勒斯坦为后发现代国家“沦落”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外缘)线而叹息,我们却信心满满:不因“外缘”拒绝当下的世界,不因“外缘”退回老旧的“内核”,势将世界体系的外缘线看作旭日跃升的地平线、博取胜利的起跳线,从这里出发,发动精彩的跳跃,实现文化的更新,博取民族的胜利。

当代中国应该坚定地向太平洋进发,毫不动摇地改革立国、开放立国、国际贸易立国。这样的前景已被世界看好,德山二郎著有《太平洋成为美国与华人的海》中曾说过:过去曾以为“太平洋是以日本为中心的海”,现在观点改变了,应该说,“太平洋将成为美国与华人的海”,“华人即将超越日本,这在我的预料之中”。

1988年学林出版社的版本,是本书的初版本,后来有1993年台湾地区博远出版公司版本。这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第三版。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储德天老师为本书再版付出的辛勤努力,感谢朱杰人社长给予作者的关心与支持!

盛邦和

2010年7月22日

序

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两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门户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之前也大体相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受到西方工业文明激荡的中日两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几乎同时迈开了近代化的艰难步伐(中国的“洋务运动”还先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六七年),然而,此后两国在现代化的竞赛中实绩颇相悬殊,日本竟然遥遥领先于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这一十分严峻的事实引起觉醒了的中国人的思考,百余年来,有识之士就此发表过许多分析文字,至今读来,仍能拨动心弦、启发神智。不过,昔人的分析意见大都失之零碎,缺乏总体的、系统的把握。近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和国人视野的拓宽,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和研讨,其深度和广度都不可同日而语,这反映了人们希望从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比较中获得启示的愿望愈趋强烈。令人高兴的是,正当此时,盛邦和为我们提供了《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一书。该书运用比较的、系统的方法,从文化视角考查了中日两国现代化过程出现巨大差异的复杂原因。

邦和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的中心观点是“内核——外缘”两重构造论。他指出,世界由各个文化区组成,每个文化区又由“内核”与“外缘”组成,而“内核”与“外缘”性质殊异——内核文化是古老的、纯种的、发育完善的、自生根的文化,外缘文化是年轻的、非纯种的、发育不完善的、非自生根的文化;内核文化具有强大的遗传传递力,外缘文化则比较便于嫁接新文化,因而实现文化更新比内核文化轻捷得多。在“中日东亚文化区”内,中国文化属于“内核”,日本文化属于“外缘”。由于中日两种文化的这一差异,决定了它们在现代化

过程中的不同经历和结局。邦和还论证,在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化已从“内核”转移到“外缘”,随着“内核”的至尊地位的失落,而有可能获得文化更新的生机,中华文化复兴的希望正寄托于此。

邦和谦逊地称自己上述观点为“假说”。然而,我读罢全书,窃以为“内核——外缘”两重构造论固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需要从诸方面加以完善,但它已经具备一个科学理论的良好框架。运用“内核——外缘”两重构造论可以相当有力地解说包括东亚文化区在内的许多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文化区发生、发展、衰落、更新(或灭亡)的历程,可以比较合理地诠释中日现代化进程出现明显差异的原因,因而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不可低估。

邦和在其论著中广为吸收了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并加以融铸、再造,这是本书生机勃勃,使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邦和构筑理论体系的执著努力,得益于他开阔的视野和对新知识的广采博取。从事一个特定领域的理论构建工作,固须广泛借鉴各相关学科的研究结论和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在这样做时,又应十分谨慎,尤其是将自然科学的结论和方法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一般应将该自然科学学科的具体研究成果上升到哲学高度(包括方法论高度),只有如此,方具备涵盖社会科学的普遍意义。但邦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相信他今后能够更深刻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使其理论体系更完备、更科学。

今年6月上旬我到上海参加“国际王国维学术讨论会”,初次结识邦和,立即为他的诚挚和好学所感动。邦和嘱我为其论著写序,这对我也是一种鞭策与鼓励。近十天来,我兴味盎然地阅读邦和的书稿,每每为其雄辩的论证所折服,为其“破译”某些“历史密码”而击节赞叹。无奈我只有一支不灵便的秃笔,记下以上“卑之无甚高论”的话语,权作序言,以谢邦和并待教于读者诸君。

冯天瑜

1987年6月24日于武汉

目录

再版序言 / 1

序 冯天瑜 / 4

绪论 / 1

第一篇 构造论 / 19

第一章 三个“世界”、四个“同心圆”及中日东亚文化区 / 21

一 “手掌”上的三个世界 / 21

二 三种文化 / 26

三 四个“同心圆”，中日东亚文化区 / 32

第二章 文化区内核与外缘二重构造及模型 / 38

一 经济区“中心—边缘”论及其他理论命题 / 39

二 “中心地”理论对文化区模型的设计 / 47

三 文化源地及其辐射在文化区整合过程中的作用 / 52

四 “内核”中的“外缘”与“外缘”中的“内核” / 56

第二篇 比较论 / 65

第三章 中国内核文化区与日本外缘文化区 / 67

一 鉴别的标准：“中心经济区”与“文化源地” / 67

二 中国内核文化区 / 72

三 日本外缘文化区 / 82

第四章 日本典型外缘区成因 / 91

一 充足辐射外缘区与不充足辐射外缘区 / 91

二 交通系统障碍 / 97

三 社会系统障碍 / 101

四 文化系统障碍 / 134

第五章 两种文化的特质区别 / 139

一 古老文化与晚进文化 / 139

二 辐射文化与受容文化 / 145

三 复合文化与单一文化 / 151

四 原型文化与型变文化 / 162

第三篇 更新论 / 183

第六章 文化更新 / 185

一 文化会衰落吗? / 185

二 文化衰落后的三个前景与文化更新 / 188

三 中日文化近代的状况 / 190

第七章 中日文化近代更新的命运 / 194

一 东西方文化更新方式论 / 194

二 中国内核文化“更新迟滞性”与日本外缘文化“更新便捷性” / 197

三 关于中日文化更新迟速原因的进一步考察 / 202

第八章 内核的位移与外缘的转化 / 212

一 文化重心“蛙跳式”移动与中国内核地位失落 / 212

二 中国外缘地位与中国文化性质转换 / 215

第九章 世界文化区重组与中国“三重叠外缘文化”特征 / 220

一 印度文化区、阿拉伯文化区的衰落与欧洲文化区的
“裂变” / 221

二 亚太文化区的形成 / 223

三 新文化区的特点 / 226

四 中国“三重叠外缘文化” / 228

五 中国文化更新的“三方位受容” / 234

第十章 结论：中国“外缘”文化更新的前景 / 239

后记 / 247

绪论

“一个豆荚里的二颗豌豆”，人们时常用它来比喻中国和日本。的确，两国隔水毗邻，“同文同种”，黑发黄肤，又都食稻米，都拿筷子，都会将大豆磨成豆腐，并都使用汉字，在历史上还都信奉儒学。概而言之，实在太像了。然而，这两个国家在近代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前者积弱不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者赳赳日进，跻入西方列强的行列。两颗相同的“豌豆”，同样种在东亚的土地上，竟长出不同的枝叶，结出不同的果实。这是为什么呢？



为解答这个问题，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潜心研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有的从民族精神与国民性视角作出回答。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指出，由于日本领导者“英明睿智”和日本国民的“勤奋与灵活”，遂使他们在“停滞、太平的孤立之梦”被美国佩里舰队打破后，勇敢地建立了“明治伟业”。^① 王金林著《简明日本古代史》、吕万和撰《简明日本近代史》中说，日本的古代史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民族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民族。他们积极地把外民族的先进文化吸收过去，加以消化。更由于这种宝贵精神在近代又得到发展，故当海衢大通，西方文化东传时，能强学猛进，终于在极短时期内，使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工业大国。两位学者针对日本为什么

^①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 页。

近代发展较快,还提出了其他许多有益的观点。埃德温·赖肖尔所撰的《日本人》则研究了日本“岛国民族”的“特殊品质”,以及这种品质对近代化的意义。著名日本研究著作《菊与刀》出版后,一直畅销不衰。颇有启迪意义的是,书中通过对日本儒教的剖析,阐述了日本文化在近代化中的作用。这本书的作者鲁斯·本尼迪克特说,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由于日本人对儒学中的“耻”特别敏感,故“深怕含耻受辱”而产生非同一般的“律己”精神,能熬过最困难的时刻,完成本国近代化。许多研究家还强调,日本尤注重“忠”、“信”观念。此类儒学思想在心中根深蒂固,使日本获得莫大的民族凝聚力,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取胜利。日本森岛通夫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开展对日本民族精神的研究。他的《日本为什么成功》引证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原理指出,“近代化”并不等于一种可以触摸到的物质,如机械、枪炮和舰船,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在西方是更新了的天主教即清教(新教),在日本则是更新了的儒教。他说:“日本的儒教开始时与中国的儒教信奉同样的准则,但是由于对这些准则所作的不同研究和解释,其结果在日本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风行中国的民族精神。”^①他强调,正如从天主教信仰的怀抱中脱离出来的行动都必然导致一场反叛和革命,“日本式儒教”从中国儒教的怀抱中脱离出来,也导致对中国传统农业封建思想的深刻反思与叛离,从而使日本在近代将儒教改造成适合资本主义的“工业精神”,并使日本在较少思想羁绊的情况下,顺理成章地发展资本主义。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儒教一成不变地停留在“初始型”的农业文化格局上,故不能成为近代化的“精神促进素”,相反其消极部分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化发展的文化阻力。

笔者的写字桌上放着一本书,时时翻检,获益匪浅,这就是日本东京大学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的论著——《日本社会》。此书通过对中日社会结构的比较,提出了著名的日本社会“纵式结构”理论,客观上回答了日本近代发展较快的原因。这个理论指出,日本已转变

成为一个“非家族”式的集团社会(区别于家族的超血缘地域与职业集团),当日本历来的血缘家族社会走向消亡时,原有的人际关系格局与习惯力量并不一下子消失,而是介入到社会集团组织中去。因此在日本,无论公司、工厂、军队、学校;无论商界、政界与学术界,人与人都依“纵式结构”与等级差序排列起来,显示出规则的A型构造。这种人群结构有几大特点。其一,具有集权性。每个人群(或称集团)都呈“亲——子”关系。其中“亲”具有至上权威与对所辖人群的“整合力”。处于“子”地位的人,则对“亲”表示绝对的服从。其二,等级性。在纵式结构中“亲——子”关系是多层组合的。故每一层次之间都呈现判然分明的等级差距。其三,依赖性。“亲”对“子”施以“恩”,“子”则报以“义”。中根千枝指出,正是这种“纵式结构”的存在,使日本全民族崇尚“团队”精神,排列成一种特殊的服从指挥、结合紧密的“队形结构”,齐步向近代化目标突进。中根千枝指出,在中国家族结构中,上述纵式结构固然存在,但在中国广泛的超血缘“职业集团”及其他人群结构中,这种纵式结构形式并没有建立,或达到日本式的典型化。因此,读者体会到的是,中国无法获得这种结构形式给近代化带来的有益促进因素。

如果我们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几十年来不少中日社会史学家还曾经把中国描述成农业家族式、“大陆水利式”的封建专制社会,即典型的“亚细亚”社会。他们指出这种社会结构形式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而迫使近代工业时代姗姗来迟。他们转而论述日本并非典型的“亚细亚型”国家。致使较中国更容易接受资本主义,并于1868年爆发明治维新,走上工业发展的轨道。

除上述论断之外,有的学者从对照中日两国立国方策入手,也得出许多新鲜的结论。日本森谷正规所撰《日本的技术——以最少的耗费取得最好的成绩》,应用“技术比较论”的方法,研究日本近代经济“起飞”的原因。他试图揭示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明治维新以来制定了“技术立国”的国策。他指出由于日本工业化和改进产品能力迅速增长,业已取得技术商业化的优越地位,致使其在国际竞争中获取胜利。美国马宾·吉·沃尔夫(Marvin j. wolf)在《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中把日本的成功归于政府对经

济生活的干预与建立所谓“经济集权主义”。他说：与西方不同，日本“在向国外市场进行大规模渗透的背后，则是一个在政府主导下的，称之为经济集权主义再恰当不过的企业活动体制”，这种体制又称作“政企联合体制”。日本的全部经济活动，其实质是“以设在东京的一座十一层小楼，即通商产业省为司令部而推行的国家阴谋。”^①

最近，在日本产生一种新的“教育经济学”理论，认为：科学技术，人的受教育程度，生产者的技术能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这些因素被称为“人的能力”，它被“开发”而获得提高并不亚于物质的资本以及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从此理论出发，日本历史学家在回顾既往时，得出一条重要结论：重视人力开发与教育是日本的“立国之本”。日本永井道雄及中国学者李永连在《近代化与教育》、《战后日本的人力开发与教育》等著作中表达了这种观点。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没有注重以小学教育为基础的“全民普及教育”，故没有实现日本式的“人才开发”与达到全民素质提高的目的。这是中国近代化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许多研究家还注意到日本发展不仅有其主观原因，而且还有许多中国及其他国家无法得到的客观原因。日本金泽良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日本实际上处于战局之外，成为参战国的市场，并获得了先进参战国的海外市场。以及，由于杜绝进口，给国内工业带来了发展的机会。”^②有的学者在讨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时，提出日本因曾受到以下三点客观有利条件的帮助而导致发展的局面：（1）美国的扶持。美国的战后日本政策始终被以下思想指导着，即“对日占领政策的方向，在于培养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使日本在今后对远东可能产生的新集权主义的威胁发挥防波堤的作用”，^③日本“在亚洲是关键的战略要地”。由于这些政策思想的确定，美国对日本一直采取扶持、援助的方针。这对

① 马宾·吉·沃尔夫：《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② 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③ 转引自《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日本从战争废墟中重新站起来,有重要作用。(2)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滋养”。这是说在美国在侵朝、侵越战争中,日本的工业由于受到美国军事“直接特需”的刺激,获得极大的军需市场,从而扶摇直上。(3) 获得东南亚的广阔市场及原料来源地。吉田茂在 1962 年出版的《大矾随感》一书中说:“战后,日本丧失了满洲、朝鲜等海外领土、丧失了供给原料的资源。我希望东南亚能够代替满洲、朝鲜等地。”^①确实,由于东南亚市场向日本的开放,使日本经济能不断获取活力,并且不断给矿产贫乏的日本注以“资源血液”。日本都留重人的《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的《战后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等书对此都有详细阐述。

上述种种理论无疑都具有合理的成分。确实,日本民族由于“勤奋与灵活”,由于善于汲取外来优秀文化,由于通过“儒学更新”,使日本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这就使日本在近代迅速获得近代工业化的成功。但是与日本相比,中国同样是勤劳勇敢的优秀民族,为什么日本在近代走到了前面,而中国落后了呢?即以“儒学更新”而言,为什么一百年来,儒学更新能在日本发生,而在儒学的“发源地”——中国却没有迅捷地完成“更新”呢?

就社会结构而言,为什么日本是典型的“纵式结构”社会,而中国则不是?为什么中国是“亚细亚”社会而日本却是“半亚细亚”社会,许多亚洲大陆社会的特点在日本时隐时现、表现不突出呢?

而造成一个国家与民族发展状况的主要是其内在因素,其地理、国际环境的因素也只能是偶然的与外在的因素,并不对日本的经济、社会变迁起决定作用。

二

这一连串的问题启示笔者,造成中日近代发展迅速差异的,一定还有其更深层的隐蔽的原因。然而,这深层的隐蔽的原因又是什么

^① 引录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经济研究所《战后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第 45 页。

呢？人们为此而苦思不已。理论的产生在于社会对理论的需要。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或现实问题放在人们的面前，令人费解，而且对社会的现实又具有重要意义时，人们对理论的需求便显得分外迫切。因为一个能解答现实问题的理论，是夜海闪电，能以白炽之光划破重重迷雾，照亮历史的汹涌的洋面；是医生用的解剖刀，银光一闪，骨肉判然，使许多历史之谜解析分明于眼前。

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启示笔者把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发展状况作为两个“大文化”体系加以分析评判。由此，笔者冒昧地提出了文化区“内核——外缘”二重构造的假说，认为世界由若干个文化区组成，每个文化区都由“内核”与“外缘”组成，而“内核”与“外缘”性质殊异。又认为中国与日本分别是中日东亚文化区的“内核”与“外缘”，因而造成两国文化传统性质的重大差异，这正是中日两国近代化发展迟速的深层原因。

在设想、构思这个“假说”时，笔者阅读了不少历史、文化、心理、地理、人口、社会等学科的书籍，但结果仍从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中找到明确有力的学说依据，找到了打溅思想火花的宝贵燧石。

笔者首先注意到的是恩格斯(1820—1895)关于经济区与经济中心区的论述。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英国伦敦时曾提出：“英国是全世界的商业首都。”^①这表现了如下的含意：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组合成一个偌大的世界性的经济大区，而伦敦已成为这个大经济区的“首都”，也即“经济中心”。

列宁(1870—1924)也有类似的思想，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首次提到“经济区”的概念。他引证理·卡尔韦尔(R. Caiwer)的理论指出，整个世界在近代世界融合成一个庞大的“世界经济体系”，实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区，但又可“把整个世界分为‘主要经济区域’”，并指出有三个区域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区的“高度发达区”，即中欧区、不列颠区与美洲区。他在另一篇文章《关于德国各政党的最新材料》中又指出：“在现代各个国